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现代化理论史的视角*

赵刘洋

[摘要] 西方现代化理论依据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以形式演绎逻辑构建起一套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模式，进而否定任何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实践中生成的现代化，推动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应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悖论关系，重构关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从而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奠定重要基础。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 国家与市场 国家能力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C09;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3)04-0038-09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理论奠定深厚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项伟大实践，为现代化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人类如何实现现代化贡献出重要的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海外中共学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号21VVSZ1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刘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①要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逻辑，不妨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入手，分析西方现代化模式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张力，以此为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提供启发。

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构建及其问题

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深厚思想基础，其核心在于预设西方资本主义是现代化唯一道路。二战以后西方现代化理论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他们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比如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构建社会系统理论奠定现代化理论基础，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构建起一套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②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理论普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将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视为克服传统最终和西方社会趋同的过程，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市民社会等成为影响至今的关于现代化的支配性观念。

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强化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曾被广泛讨论，作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典型版本，福山继承了黑格尔（G. W. F. Hegel）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普遍同质国家”思路，但却将哲学讨论高度意识形态化，其主要目的在于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辩护。^③“历史终结论”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认为东欧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失败，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唯一道路。为更清晰说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我们先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历史终结论”为例，分析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构建及其问题。

（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构建

说起“历史终结论”，便不能不提到其缔造者福山。福山主要讨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当时东欧剧变？在他看来，大多数分析家由于缺乏概念框架而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究竟是历史偶然还是历史必然，福山认为这些事件意味着此前政体形式由于各种缺陷最终走向崩溃，西方自由民主制则不存在这些缺陷，因此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典范。^④那么“历史终结论”究竟如何构建，又存在何种问题？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这些时期的现代化理论代表性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代序第10、20页，第9页。

④ 这篇文章源自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得到施特劳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的支持。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3.

首先,“历史终结论”最明显的问题是将现代化视为脱离于具体实际的抽象理念展开。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唯有置于更大的目标或目标之下才有意义,目的达成必定导致历史过程的完结。^①“历史终结论”将现代化视为具有明确终点的连续过程,认为人类历史最终会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希望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中寻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模式,而这套模式标准即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其次,福山将“历史终结论”归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但这种理解显然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误读。福山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就会终结。^②尽管黑格尔晚年哲学系列讲座尝试整合世界不同思想传统,^③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希望描述关于“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如何经历艰苦而漫长的道路成长为“绝对精神”:^④“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那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⑤问题在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历史终结论”相距甚远,“绝对精神”主要是作为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本体论基础,因为精神本身“不必须是它自己的对象,但既是直接的又是扬弃过的、自身反映了的对象”。^⑥事实上,真正对福山产生启发的是科耶夫对黑格尔的阐释,福山将科耶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阐释者,原因在于科耶夫曾提出黑格尔认为历史终结于1806年耶拿之役的观点,因为通过拿破仑,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扩展至普鲁士。^⑦所以,科耶夫对福山的真正启发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现实化和意识形态化。

马克思希望通过对英国道路的分析来揭示人类社会演变规律,但是随着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失望和对俄国道路的关注,马克思越来越倾向于给予不同回答。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回信。查苏利奇之所以给马克思写信,主要是她希望马克思能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给出一个答案,因为俄国农村公社土地问题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英国道路存在明显差别,俄国社会主义是否可以保留农村公社而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在最后正式的回信中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说道:“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⑧脱离真实历史实际构建相应理论是马克思无法认同的。马克思反对那种将历史演变抽离于具体实际进而将其哲学化的做法。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件中,马克思批评将历史哲学化并将其作为理解历史的一把万能钥匙的做法,在他看来,真正具有意义的工作是将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会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⑨那种不顾真实而将历史哲学化的做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实际。

再次,福山“历史终结论”承接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谱系中的乐观派,这种理论的明显问题就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76页。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84—85页。

③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4—67页。

④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⑤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65页。

⑥ [法]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149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0页。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0—731页。

是否定现代化道路多元性，这和福山的新保守主义立场紧密相关。在西方理论传统中，乐观性现代化派别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表现，但核心都认为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最高阶段。^①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他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他将当时世界出现的政治变化和哲学讨论联系在一起，试图为西方政治体制辩护，认为西方政治体制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巅峰。显然，这种认知和现代化实际相距甚远。

（二）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实际的矛盾

概而言之，西方现代化模式虽然内部纷繁复杂，^②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其核心皆将西方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唯一道路，将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视为和西方趋同的过程；其次，西方现代化理论忽略了不同国家具体实际和历史传统，将现代化的实现视为脱离具体实际的抽象理念展开；第三，否定非西方国家探寻适合本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所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大问题就是脱离于真实历史实际，区别西方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现代化历史实际可以发现，纵然是西方现代化历史实际本身也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明显不符：

第一，西方现代化历史实际与“看不见的手”的单一建构并不相符。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推行重商主义，国家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殖民主义，其动力主要来自国际战争，要争夺国力就必须大力支持能为其提供财力的大型外贸公司扩张，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最为兴盛的19世纪恰恰是英国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建立自由放任的国际市场成为英国殖民侵略扩张的借口。^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认识要看到其对西方现代化实际的掩盖。

第二，西方现代化道路复杂多样。伊万·塞勒尼（Ivan Szentenyi）曾指出：19世纪的德国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就兴起了“特殊道路”的讨论，即如何既避免个人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俄国式的专制方式，近代德国现代化走的恰恰是一条在英国和俄国之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英国现代化之路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俄国现代化道路是由国家官僚领导，而德国现代化的领导者是“文化资产阶级”。^④无论对“特殊道路”理论如何评价，至少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内部曾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并探索不同道路。

第三，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赶超事实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同样不符。美国、日本及韩国的成功崛起明显挑战了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念。美国工业是在资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没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高关税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即使在1846—1857年即美国所谓的“自由贸易”时期，当时平均关税税率仍高达25%。^⑤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德川时代日本资本积累缺乏，而明治政府采取明显国家干预，高度重视对战略性行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代序，第9—12、76—81、86—89页。

② 近十年来，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更加狭窄，而不是更有包容性，See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 “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6, 2009, 1043–1058; Mokyr J.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2016;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Non-Modernization: Power – Culture Trajecto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2020, pp.323–339.

③ [美] 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④ [美] 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⑤ 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业进行支持,由于得到国家强力支持,这些行业技术很快就赶上西方最先进的水平。^①韩国崛起也是如此。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白手起家到1988年已拥有年产60万吨乙烯、34.7万吨丙烯的生产能力,不到20年时间已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运营石化联合企业,这是韩国政府努力推行工业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②但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中国国家干预的基本事实皆被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忽视。

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经济学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质差别在于性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性质而言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二者在所有制结构上明显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上,西方现代化则建立在私人产权主导的所有制结构上,这就决定了两种现代化道路在国家 and 市场关系问题上呈现明显不同的形态。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典型版本“历史终结论”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而容易辨别的话,那么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重要依据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因其运用演绎逻辑而将具体实际排除于理论构建则不易辨别,但二者实质上互相呼应,国家和市场对立,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视为现代化唯一途径。

(一) 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

我们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基本演进脉络进行简要梳理,以此展示西方主流理论是如何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作为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斯密(Adam Smith)指出,惟有自由竞争才能促进社会财富增加,他批判重农学说和重商主义学说,认为那种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财富增长的做法其主张和实践只能是背道而驰。^③斯密强调国家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观点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进一步形式化以论证英国自由放任政策的合理性。^④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观点被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更加显示出“公理化”特征。^⑤演绎方法由此占据支配地位,比如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进一步强化了演绎学派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在边际效用论基础上提出了契约曲线;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发展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希克斯(John R. Hicks)提出了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替代弹性等概念从而建立了完整的消费者理论。^⑥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追求理论内部一致性时则与真实经济世界越来越远。纵然是与实际紧密相关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也只是经济要素以何种机制影响增长,不关心经济发展

① [加] 赫伯特·诺曼:《日本维新史》,赵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116—123页。

② [韩] 金滢基、马骏:《政府在获得技术能力方面的作用:对东亚石化工业的案例分析》, [日] 青木昌彦、[韩] 金滢基、[日] 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17、125页。

③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12、428、656—657页。

④ [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3页。

⑤ [英]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6—47页。

⑥ 关永强、张东刚:《英国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1870—1940)》,《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理论、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还是卢卡斯（Robert Lucas）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从本质上只是关于增长机制的学说，而不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一般理论。^①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极力反对国家干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与兰格（Oskar Lange）等认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家们论战，高度简化私有制、经济计算与合理经济之间的关系，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合理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将国家和市场对立且意识形态化。^②总之，西方主流理论认为现代化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化途径，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③

（二）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制度分析的市场主义逻辑

我们以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例，来说明西方主流理论在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明显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尽管纷繁复杂，但核心理念皆将私有产权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前提，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斯（Ronald Coase）不满足于新古典理论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做法，突出“交易成本”在经济分析中的关键地位，而将新古典理论的演绎方法扩展至制度分析上。^④巴泽尔（Yoram Barzel）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会特别关注产权，主要是在真实市场交易中存在成本。^⑤诺斯（Douglass North）在关于西方崛起原因解释的研究中开篇就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⑥科尔奈（János Kornai）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属于典型“短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类型对立，^⑦短缺的根源在于企业依赖“官僚协调”，只要依赖“官僚协调”，就必定涉及“预算软约束”，后果就是企业生产效率低下。^⑧科尔奈在东欧剧变之后彻底走向西方新自由主义。^⑨以上所概括的科斯和科尔奈的理论都曾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产生广泛影响。

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主要遵循市场主义逻辑而将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唯一道路，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在理论预设方面，西方主流理论从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将私有产权与经济发展建立线性关系，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能；第二，从研究理念而言，西方主流经

① 张军：《“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读林毅夫新著〈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2卷第3期。

② 保建云：《论新自由主义逻辑陷阱、内生极端化与华盛顿共识困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③ 赵刘洋：《中国经济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瞻性理念》，《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5期。

④ [美] 罗纳德·H.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⑤ [以] 约拉姆·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二版），费方域、段毅才、钱敏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⑥ [美] 道格拉斯·诺斯、[美] 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⑦ [匈]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22页。

⑧ [匈]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37—138页。

⑨ [匈] 雅诺什·科尔奈：《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朱桂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济理论倾向于模仿自然科学，忽略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社会福利意义；^①第三，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国家干预必定带来无效率，显然和实际不符。如前文所述，这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明显干预的基本事实明显不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无论在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国家皆明显起到关键作用。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能依赖西方话语，而是应该真正回到实践，重新构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

现代化道路选择应该根植于本国具体实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明确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时期我们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②因此，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应该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展开。

实践是根植于不同国家自身的历史和实际的，要由实践出发发现真实问题。近些年，国际学术界普遍出现知识论层面的“实践转向”，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布迪厄看来，正确途径是探索实践逻辑，因为实践逻辑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包容性。^③构建现代化理论应该关注中西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差异。与西方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选择的是政党主动引领型的现代化路径，主要依靠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资源加快工业化建设的路径推进。现代化≠西方化，构建现代化理论应该紧密围绕中国现代化实践而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层面：

第一，从现代化途径方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采取一条通过赶超战略实现加速完成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路径。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赶超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西方现代化模式市场主义逻辑出发，自然得出否定性结论。然而回到现代化实践，就会发现赶超战略和经济发展并非对立，这一战略为中国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赶超战略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筹调配资源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举国体制”的构建。首先，这种发展战略带来的重要影

^① 关永强、张东刚：《英国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1870—1940）》，《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2—54页。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响是工业经济迅速发展。^①其次，赶超战略当时在全球具有广泛吸引力，主要是后发国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快进行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真正独立，并且有效应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的经济危机问题。再次，赶超战略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国家由此有效实现了资源整合，国家拥有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其他优先战略资源调动的财政能力。^②最后，通过赶超战略，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网络。^③没有国家能力建设，单一依赖市场很难取得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统筹资源加快建设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方式为经济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第二，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不仅能够深入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同时能够针对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竞争中干部晋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和短期利益，^④实践中带来的明显问题就是地方经济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一方面会推高房价而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将生产性资本挤出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⑤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今天则遇到诸多挑战。因此，经济发展要真正贯彻新发展理念，改变过去围绕GDP增长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做法，重视民生领域改革和科技创新等，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应能针对实践提供政策建议。

第三，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应该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具有自主性的概念。我们具体以在经济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内卷化”概念为例，分析如何回到实践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新古典理论将竞争性市场运作带来经济发展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然而在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演变的经典研究中，黄宗智就深刻反思这一理念。华北地区家庭农场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而无法根据需要解雇自家多余劳动力，生存压力下此种劳动力集约化程度可以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显示同样逻辑，过密型增长并未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因为它已经达到高产台阶，农民面对土地-人口压力而不得不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家庭经济必须同时依赖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否则难以维系生存。^⑦今天中国农村的基本事实即是劳动力大量外流，这些外流劳动力构成了“非正规经济”就业群体的主体，“半工半耕”逻辑与新古典理论将市场化等同于发展明显不同。^⑧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市场化必定带来发展，近代中国实际却是商品化和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同时并存，这必然要对市场推动发展的前提性认识提出深刻质疑，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未必同

① [美] 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② [美] 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第61页。

③ 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④ 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 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⑥ [美]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15、65—66、301—303页。

⑦ [美]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4、78—80、85—86、305—308页。

⑧ [美]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读书》2006年第2期。

步发展，应该直面悖论现象，对中国悖论现象深入研究以打破规范性信念的限制。^①相信这种根植于中国实际又带有重要理论含义的概念，必定会对现代化理论创新贡献重要智慧。

总之，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理解应该将其放置于国家能力建设的脉络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没有采取和资源禀赋条件相一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而是将资源投入机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部门，这种发展战略带来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工业经济迅速发展，更为深远的是由此有效实现了国家资源整合，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力，但是单纯依赖国家能力无法解决人均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提高，尽管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有限。改革是通过集权国家放权方式来实现的，“集权-分权”的治理体制保证了国家意志能够有效转化为行动力，同时能够发挥地方创造性，这种独具特色的治理体制既推动了中国经济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深刻启发人们应该正视人类发展道路多元性，也为理论创新奠定实践基础。因此，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应该回到实践，进而依据中国具体实际重新构筑一套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实践中生成的现代化，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西方主流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高度简化和理想化，由此构建起一套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狭隘现代化模式，忽略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应该重视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国家放权来实现的：一方面，积极培育市场机制，推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创造；另一方面，借助分权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中央保持人事组织和财政方面的权力集中。这种独具特色的“集权-分权”治理体制保证国家意志能够有效转化为行动力，既实现了中央权力集中，同时能够发挥地方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相悖之处，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重新构建一套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自主性知识体系，这种理论也将会为现代化理论创新贡献中国智慧。事实上，当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西方自由民主制放回历史就意味着他已然从“历史终结论”立场上撤退，这也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对那些高歌“历史终结”的人的深刻提醒：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②

[责任编辑 吴大磊]

① 赵刘洋：《“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②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7页。